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六二）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二八期 ——
(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9f)

【研究报告】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	朱 正
【前车之鉴】文化大革命的启示	王力雄
【书刊评论】红卫兵红八月的心理关口	鲍志奋
【难忘岁月】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 ——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六）	刘光耀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研究报告】

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

• 朱 正 •

◇ 反右派斗争的远因

1957年发生反右派斗争不是偶然的。第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候的猛烈爆发；第二，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一同致力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其他政治力量，即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主要代表的民主党派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候的猛烈爆发。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的前夕，提出了一个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不言而喻，这是把知识分子看成一个有待团结、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异己的力量。这一方针的核心和重点，是“改造”这一项。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在全国知识界开始了历时近一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运动的目标，就是彻底摧毁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正义感和独立精神，使之产生一种原罪感和负罪感，感到自己的出身、教养、经历、社会关系和世界观……无一不是有罪的。在运动的进行中，普遍采用侮辱人格的手段。史学家顾颉刚1952年的日记中记下了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感受：李琦同志因本组同人认识不够，批评不真切，帮别人提意见亦不足，破口大骂，真有“到此方知狱吏尊”

之感。（7月30日）学委会派来干部，每盛气凌人，一副晚爷面目，自居于征服者而迫人为被征服者。（8月8日）

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感觉，就好像狱囚遇到了狱吏，被征服者遇到了征服者一样。经过这样一番改造，一些胆战心惊的知识分子只好努力去做一个伪君子，以保平安。这也正是思想改造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

对知识分子更沉重的一击是1955年的肃反运动。这场被称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紧接着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这场文字狱开展的，遍及全国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大学师生、中小学教职员工、工商企业、文化团体……都在紧张进行。列入“肃反对象”的多达一百四十万人，占当时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四分之一以上。从胡乔木为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撰写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中可以知道，在这数以百万计的肃反对象中，查出了“现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之多”，另外还查出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八万一千多人。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是指1949年以前在旧军政机关担任过一定级别以上官职的人。而在占肃反对象百分之九十四以上的那一百三十多万人，不但没有现行问题，就是在履历表上也没有任何“反革命”记录的。把他们列为肃反对象来审查，来斗争，只能说是斗错了，肃错了。不用说，这被错斗错肃的一百三十多万人，当然是满腔的委屈和怨恨。

肃反运动是1956年基本结束的。正好这时候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表示出一种广开言路的姿态。于是，这一百多万被错斗错肃的人中间，就有许多人趁此机会诉说冤苦了。这表现为当年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大矛盾。

概括地说，经过从思想改造运动到肃反运动这些不间断的大小政治运动，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打击。因而就形成了“党和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的知识界的某种紧张关系”。

怎样解决这一矛盾，缓解这种紧张关系呢？在知识分子这一方，希望对于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所受到的无端伤害，给他一个说法，还他一个公道。他们对于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按照自己最大的好意去理解，以为肃反之类的政治运动，正是整风运动所要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集中表现，以为自己蒙冤受屈的问题可以在整风运动中得到解决。殊不知这并不符合毛泽东整风的本意，毛最终是用反右派斗争来解决这一矛盾，把诉说冤苦定性为倡狂进攻。由此可知，反右派斗争是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的猛烈爆发。中国的民主党派是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代表，他们不满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也同共产党保持着距离。当国共两大党的斗争激化起来，在“二者择一”的条件之下，多数选择了共产党，追随共产党投身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殊死斗争中，大敌当前，也很需要民主党派的合作，至少在影响敌占区人心向背这一点上他们能起的作用甚大。在这个时候，对他们即使有所不满，也是采取一种忍让克制的态度。1948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对中间派和中产阶级右翼分子政策的指示》中说：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

可见是十分注意不要得罪这些同路人，而在心里却早已打定了胜利之后跟他们分手的主意了。苏联解体之后，从公开的秘密档案中可以看到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史达林的电报，其中明确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以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史达林没有同意这个意见，他在复电中表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它们还将长期存在，……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一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大约是几年之后毛泽东提出“长

期共存”方针的最早渊源。

中国的那些热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是因为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政治主张，才组织民主党派，才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才因此和共产党走到一起来的。当国民党的统治即将被推翻的时候，他们曾经幻想可以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了。1948年10月，罗隆基以民盟留沪中委的名义，“写了一个向中共的建议书，主要内容为：1.内政上实行议会制度；2.外交上采取所谓协和外交方针（即对美苏采取同样友好方针）；3.民盟有退至合法在野党的自由；4.在盟内的共产党员应公开身份，党员和盟员避免交叉”。这些意见，都是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

国民党被赶出了大陆，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共产党和这些民主党派的矛盾就尖锐了起来。其实，共产党早就预计到了这一点并且决定了对策。1947年12月17日周恩来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中说：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文件的时候，加写了这样一段：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

现在回头看就很清楚了：从这个文件发出之日开始，到反右派斗争为止，十年之间，共产党就是按照这个态度处理它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一步一步实施这个既定方针。到了1957年，矛盾积累到了极点，终于给了他们毁灭性的一击。这些民主党派从此名存实亡，不再是一种多少有一点独立性的政治力量了。

◇ 反右派斗争的前奏曲：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了整风运动。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以《这是为什么？》为题的社论，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写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就内容和性质来说，反右派斗争首先是算前一阶段整风运动的账，所以有“由整风转变为反右”一说。就时间顺序来说，也可以说整风是反右的前奏曲。我们在探讨反右派斗争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之前，要先看看整风运动。

就我看到过的材料来说，最早提出要在1957年开展一场整风运动的，是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这次中央全会是在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镇压起义之后几天召开的，听取了刚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少奇的报告，刘介绍了他如何同赫鲁晓夫商讨处理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情形。可以认为，这次中央全会就是为了讨论波匈事件而召开的。匈牙利事件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刺激，他当然极不愿意在中国也出现这样的事件。他在会上提出开展整风运动，就是为了避免在中国也出现匈牙利事件的一项措施。为什么开展整风运动可以避免出现匈牙利事件呢？毛在1957年6月8日写的发动反右的党内指示中作了这样的说明：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

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即照此办理，在一些地方制造出“许多小‘匈牙利’”，最有名的一案是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学生因升学问题上街游行，被人为地制造成一起民盟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处死了三个无辜者。这一案件有助于人们对毛泽东这篇文章的理解，他说的“主动整风”，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于这次计划中的整风运动的性质和做法，作了十分明确的说明：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对于人们理解整风运动的性质，这一段话真是太重要了：“整风，就是思想改造”。人们对于数年前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记忆犹新，而即将开展的整风运动原来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具体的做法，毛泽东说了一项：发动学生斗教员，人人过关。他把匈牙利那种群众上街的情形称为资产阶级大民主，那么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反右派斗争这些了。

毛决定开展整风运动，不仅是因为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也有国内甚至更是党内的原因。他在1958年3月19日为重印一批按语写的说明中说：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倡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他说的“国际方面的风浪”，指的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国内方面”的“反冒进”事件，显然更是他希望通过整风运动解决的问题。1955年12月27日，毛泽东为他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第二篇《序言》，谈到在这年的下半年，“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毛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他就这样吹响了各行各业全面冒进的号角。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冒进的恶果大量显现出来，刘少奇、周恩来这些比较务实的领导人感到形势严峻，提出了反冒进的问题。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这篇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发表的社论宣称：急躁冒进已经成了“严重的问题”，“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提出“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十分恼怒，在这一天的报纸上批了这样一些话：“尖锐地针对我”，“既然使干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七八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基调也是反冒进，其中提出：发展速度“可以放慢一点”。为了这事，后来毛泽东多次批评他。例如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调侃地说：“恩来在1956年二中全会的报告敢说心里话，这一点可取，虽然是错的。”

毛泽东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据报上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所宣布的，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一些党员的特权思想，从而改善执政党的形象，改善党与党外群众特别是知识界的关系。但是从毛在这前后发表的另外一些文章和讲话中可以知道，还有一个在《整风指示》里没有宣布的目标，就是要跟党内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算

账。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知道，党务系统在刘少奇手上，行政系统在周恩来手上，这些党政机关的干部都是他们的下属，由谁出头来向他们提意见呢？毛泽东想到了让民主党派来充当冲击的力量。

毛泽东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之后，中国的这些民主党派就成了政治上的装饰品。它的头面人物虽说大都安排了颇高的职位，其并没有什么实权，不能做什么实际的工作，更不要说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了。因而显得很消沉。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特别是在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新方针之后，民主党派一时颇觉兴奋，他们就象经过了冬眠的蛇，想要活动活动了。1957年三、四月间，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纷纷开会：致公党（3月21—23日）、民主建国会（3月22—23日）、九三学社（3月22—28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3月25—30日）、民主同盟（3月22日—4月5日）、农工民主党（4月12日）都开了会。讨论在这新气候下的工作问题。这里只举民主同盟的情况为例。民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在民盟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表示要更加广泛的参与国是。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却是毛泽东所厌恶的。这也就是后来他在反右派斗争中说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不过这时他想要打击的还不是这些民主党派，而是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他想，是不是可以来一个“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呢？民主党派哇啦哇啦提意见，对于他来说当然是一种消极因素，只是如果把他们提意见的积极性加以引导，使其锋芒针对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那就化为积极因素了。他怀着这样一种愿望，就来着手调动民主党派这个力量了。

毛泽东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在《整风指示》见报的前一天，1957年4月30日，他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城楼谈话，党中央的几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总书记邓小平也都到场。毛讲话的主旨就是请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他说了这样一些话：目前各方面批评意见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有人很担心，怕矛盾一揭发，一批评不得了。我们对人家提出的意见，不要害怕，应该欢迎，给人家以提意见的机会。矛盾没有什么不得了，到处唱对台戏，把矛盾找出来，分分类。如文学、艺术、科学、卫生等方面，提出的问题最多，矛盾突出出来了，应该攻一下，多攻一下。愈辩论愈好，愈讨论愈发展，人民民主政权愈巩固。几年来不得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几个月解决了。

整风主要是党内整风，可是有党外人士参加就更全面了。两种元素可以起化学作用。但党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尽管他对民主党派开的这些会并不高兴，但是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还是夸奖了几句。他说：最近各民主党派都开了一些会议，开得不错，提出了些问题。只要党外人士谈出来了，大家一齐搞，这就更好谈了。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帮助共产党进行工作。

召开这样的座谈会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希望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希望他们在他划定的范围之内多提些意见，这就是对国务院所属的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这些部门，也就是总理周恩来领导下的部门的工作提意见。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也就对刘少奇的系统多提意见了。假如这些民主人士能够多提意见而且符合他的意图，毛还许诺给予一份回报。他说：统一战线中的矛盾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有权无权的问题吧！过去民主人士有权了，但是没有权，所以有人讲民主人士不大好当，有些恼火，现在不但应该有职，而且应该有权。因此，这次整风，在党内对有权无权的问题也要整一整。

这天毛泽东还讲到改变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问题，他说，大学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消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这也是知识分子很欢迎的意见。不过，后来凡是

引用这话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整风指示公布之后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中共中央统战部从5月8日开始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逐日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件事进一步反映出了毛泽东借重民主人士进行党内整风的意图。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以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成问题的是，这些民主人士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完全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他们并不在毛所划定的范围之内，对教育、卫生等等工作中的缺点提意见，批评这些工作中的保守主义，甚至有人在发言中还流露出反冒进的意思，例如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就提出了“八年来的工作中，究竟是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大”的问题。会上的许多发言谈到党委代替行政直接发号施令、外行领导内行、肃反运动的偏差，等等问题，实际上涉及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体制问题和严重弊端。这些都是毛没有料想到也决不愿意听到的意见。

这些民主人士对于共产党内的情况其实颇为隔膜，不知道（或很少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在反冒进问题上的意见根本对立，而把他们看成一个统一的领导集体，他们没有想到在提批评意见的时候要分别对待，在批评刘少奇、周恩来工作中种种错误的同时要赞美毛泽东的英明正确，表示对毛泽东的尊崇拥戴。像储安平的那篇要命的“党天下论”，标题竟是荒谬的《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陈铭枢甚至直接写信给毛，批评他本人，说毛泽东“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这种表现使毛泽东震怒。反右派斗争就从打击民主党派开始。

当年有机会经常接近毛泽东的李志绥在所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到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1957年，而不是1966年发生。我们今天只记得反右派运动时对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径。其实毛开始时是想藉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未料到民主党派人士竟群起质疑“社会主义路线”和“共产政权”的合法性。毛万万没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见越来越尖锐，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的统治。毛被迫暂时回头和党内反对他的同志联合起来。党内领导人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枪口向外，出现了大团结的局面。

如果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简单化为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打击周恩来，李志绥的这个看法是不无道理的。我们确实知道这样几点：毛在发动整风运动之时确实想要同时解决反冒进的问题；为了反击向共产党倡狂进攻的民主党派人士，毛泽东不得不把反冒进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以求得党内的团结一致。李志绥的回忆录里记下了当时林克（毛的秘书）的看法：“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谈到为什么“反冒进”一阵风仍然吹遍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时候，他说，这是因为“党内除右派外，有一个观潮派，又一个促退派”。可见他无意于把党内反冒进的人全都划为右派分子，给一些人另外准备了观潮派和促退派这两顶帽子，罪名轻得多了，并且接着说，“这些同志，大都是好同志，他们的错误，是可能改的，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这种不为己甚的态度当然有助于全党团结一致去反右派。

也因此，没有能够在整风和反右中去算反冒进的账。这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反右派斗争过去之后，毛还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在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又说：“‘反冒进’的教训：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他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调侃周恩来，这在上

文已经引用了。他在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更说，有些同志不经合法手续，“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突然暴发，提出反冒进”。可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冒进问题。这笔账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才得到最后的清算。从这个意义上看是有理由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的。

◇ 反右派斗争的战果和遗产

前面已经引用过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话：“整风，就是思想改造”。准确地表明了整风运动的性质。实际上也就是预告了：反右派斗争是整风运动的最后阶段。到了八届三中全会上，要给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总结了，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真是说得简明扼要：“反右派，就是整风。”整风、反右其实是一回事，要说差别，不过是时间先后的两个阶段而已。

既然说反右派斗争是整风运动既定的最后阶段，那么，开展这一场反右派斗争当然早就在毛的成算之中。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当初毛表示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究竟是真心诚意的求言呢，还是引蛇出洞或者说钓鱼的一种手段，阴谋或阳谋？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敌视是一贯的，从延安的整风和抢救到进入北京之后的思想改造和肃反，开展一场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就说这一回的整风运动，他已经明说就是思想改造。当然可以认为在决定整风之时即有钓鱼之意，这事实上是整风运动的第一阶段或准备阶段。是知识分子不知底蕴，以自己最好的愿望去解释整风指示的文字，误入白虎节堂，自投罗网。毛泽东是把反右派斗争当作“一场大战”来指挥的，提出了要使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样的谋略。“引蛇出洞”不过是“诱敌深入”更形象化的说法，就是诱使那些将要打击的对象充分暴露自己。他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呢？在《人民日报》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他说：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

这里所说的5月8日至6月7日，正是从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开始到工商界座谈会结束的这两个座谈会期间。正是在这期间，毛泽东在具体部署反右派斗争了。引蛇出洞或者说诱敌深入就是战役的第一阶段。

李慎之认为，这时间应该更早一些。他在《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说：“毛主席引蛇出洞的决策，应该是在（1956年）10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后开始考虑的”。他引证了毛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一些内容，像“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毛的这些话当然表示他有引蛇出洞的意思了。但是我以为，这时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开展一场后来实际进行的那样的反右派斗争。我这看法有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证据，就在同一篇讲话中，毛说，对于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要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可见这时他还没有想到可以采用更加爽快的第三个办法，即给这些人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李慎之在致胡绩伟的一封信里批评了我写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按：此书的增订本改名为《反右派斗争始末》），他说：（朱正）认为毛本来是好心好意地号召鸣放，没有料到右派分子如此倡狂，他才不得不反击。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我所以在1957年写《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实际上是对朱正的反驳。这里，他不是照引我书中的原文，而是概括地转述。在我的书里，对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原因并不是说得这样简单。在他决定整风的多种动机之中，我提出毛一开始确实也包含想要消除那些太刺眼的弊端，改善一下执政党形象的愿望。这里也有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毛在5月16日写的一个党内指示。这时他已经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了，可是他在这指示中还是写了这样一段话：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毛即使在布置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仍然提出了消除一些弊端的要求。如果不看到这一方面，就未免把复杂的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要打出多少右派分子，7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一个党内指示的时候，写下了他对于“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的意见，他认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到了8月18日，他在修改统战部的一个文件的时候，写的数字增加了许多：“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最后的实际战果，“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实际上全国共定了右派分子552877人。”应该指出：这是给“错划右派”进行“改正”之时的官方统计数字，必定比当年实际所划的数字要少些。当年究竟划了多少，要等到他日档案公开的时候才知道了。不久前看到一个3178470的数字，我对它的准确性甚至真实性不无怀疑。这篇材料的标题是《反右派运动档案解密》，却没有说明是什么时候由什么机关宣布解密的，也不见档案号。再就内容看，所提出的数字也不足信。1957年那时，中国“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五百万左右”，那么这三百一十七万就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强了。在我这个过来人的印象中，没有这样高的百分比。在没有找到确证以前，暂且让它聊备一说吧。

反在派斗争的灾难性后果，不仅是它打出了多少右派分子，以及这许多右派分子及其亲友在二十二年的漫长岁月中吃了多少苦头。而且更重要得多的是：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大转折，或者如有的作者所说的是“大逆转”。邓小平也是把反右派斗争看作历史的分水岭的，他说，毛泽东的领导在“1957年反右派的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这一论断是符合事实的。

紧接着反右派斗争而来的，是大跃进。毛泽东1958年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事情也确是如此。大跃进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结果。能看出点问题，敢提点批评意见的人这时多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剥夺了发言权。那些没有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眼看到不久前别人是怎样成为右派，落到怎样的境地，当然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土法炼钢，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没有谁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就这样没有遇到一点抵抗，开展起来了。

大跃进这一场新的灾难造成了持续三年的大饥荒，饿死的人以千万计。毛泽东知道：大跃进的失败使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大大降低，于是决心开展一场新的运动，打倒有可能向他的权威挑战的党内对手，重建自己的绝对权威。这时他就在准备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了。

以打倒刘少奇为重要目的的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开始的，有材料表明：准备工作是早就进行了。毛自己说过，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就看出了问题。谁的问题？当然是刘。准备文化大革命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收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制造）能够置刘少奇于死的罪证。李冰封的《吁天辩诬董狐篇》一文谈的是历史学家吕振羽在1963年1月被秘密逮捕的事。逮捕吕振羽的目的就是要他作伪证，证明1935年11月在同国民党谈判两党合作抗日的时候，刘少奇充当了内奸。所以李冰封认为，1963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各项准备完成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 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斗争的异同

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同他在1957年发动反右派斗争一样，最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强他本人的权力和地位，打击有可能向他的权力地位挑战的对手。

在1957年，毛原来想借助为冲击力量的民主党派人士不了解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不分老和尚小和尚一律批评，不但出现了对他本人的批评，甚至还涉及到有关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根本问题。他原本就认为民主党派怀有二心，这时候更感觉到虽然八年来经过各种政治运动打压和主流意识形态教化，民主党派仍未归顺。面对着这种七嘴八舌纷纷议论的局面，他感到当务之急不是跟那些反冒进的党内对手算账，而是赶快把他放出来的那个魔鬼重新收进瓶子里去。于是以民主党派为第一个打击对象，实现了全党一致的反右派斗争：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的倡狂进攻。

因此，在1957年，任何一个基层党组织，乃至任何一个党员，都是不能批评的，谁批评了就是向党进攻。因为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这些具体的支部和党员组成的。通过这样一场斗争，党的威势大大提高了；作为党的领袖，毛的威势更是大大提高了。这里我用“威势”一词，不说“威信”。因为有人说过，反右派斗争使共产党立了威，却失了信。

到了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从一开始，毛就明确告诉人们：决不可把共产党看做一个统一体。在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个文件《五一六通知》中，毛就写下了“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的话。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更明确宣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来人都记得，当年那些大大小小的党内领导人几乎无一不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而受到冲击，这就同1957年的做法完全相反，不过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却是进一步大大提高了。

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的时候，毛还颇有一些自信。这时他执政八年，工作中积累的错误，群众中积累的不满，都不算太多。有错误，他以为也不过是某些党员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造成的，无损于整个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只要按照整风指示说的，让大家在和风细雨中批评批评就可以了。

到了反右派斗争中，甚至连这三个“主义”也不承认了。谁批评教条主义，就是攻击马克思主义，批评宗派主义，就是攻击党的领导……如此等等。用一顶右派帽子把一切批评都挡了回去。

时间又过去了九年，到了1966年，工作中积累的错误就更多了。其中还包括大跃进这样的绝大错误，甚至应该说是滔天罪行，远不是可以用“三大主义”那样的轻描淡写能够解释过去的。这时，人们对大饥荒记忆犹新，心里都在想：这些错误乃至罪行是怎样造成的？应该

由谁来承担罪责？对于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这样解决的：有一条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十七年间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切错误，灾难和罪行，都归罪于刘邓路线。毛要打击的一切党内对手，一切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归属于刘邓路线。这样强调党内的路线斗争，是1957年没有提出也不必提出的。

在1957年，毛原来想要利用的冲击力量是民主党派人士，可是他们太不识相，有负厚望，因而受到沉重的一击，早已溃不成军，尸居余气。到1966年时已经不成其为一种力量，毫无使用价值了。这一回被毛泽东找来作为冲击力量的，是大学生和中学生。看来这是他因为有了1957的记忆而作出的决定。

在1957年部署整风和反右的时候，最开始，毛并没有想到学生。是5月19日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了第一张大学报，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他们自豪地称为“五·一九运动”之后，才引起了毛的重视。在5月19日以前，毛泽东写的有关整风和反右的文件中都没有提到学生，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别的一些大学的学生们，出大字报，办民主论坛，闹哄哄，使毛泽东大伤脑筋，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在酝酿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回忆起1957年这些娃娃们为了自己认准的“理”而奋不顾身的勇气，觉得可以用来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力量。于是所谓“红卫兵”就应运而生。他们之中多是大学生、高中生，甚至还有初中生。他们更年幼无知、更轻信、更容易被煽惑。他们不但不知道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连中共执政以来十七年的历史也不甚了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从父兄的遭遇中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但被告知这是受到刘邓路线的迫害，于是他们起来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他们成群结队，四处抄家，打死老师，破四旧，闹得乌烟瘴气。他们的这种无法无天的胡作非为，都被称赞为革命行动，受到鼓励。在他们的冲击之下，各地党委在很短时期内就瘫痪了。“红卫兵”做到了毛希望他们做的事。

文化大革命当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斗会，都是1957年经验的直接继承。

毛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量采用这种革命形式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毛对这几样是如此喜爱，后来甚至把这些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写入《宪法》之中。直到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才有了一个新说法。他说：“‘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他说的是“从来”，就是说，这个“四大”不论在反右派斗争中，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

从形式上来看，文化大革命跟反右派斗争相似之处甚多，只是规模更大，持续的时间更长，受到冲击的人更多，造成的破坏也更大。在这个意义上看，反右派斗争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彩排或预演。

在1957年，毛泽东把他提出的“百家争鸣”解释为“两家争鸣”：“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

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照这样的解释，所谓“两家争鸣”，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思想后来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在《五一六通知》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口号。可见就指导思想而言，文化大革命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延伸和发展。

毛泽东想要打倒刘少奇等党内对手的目标，在1957年没有能够达到，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达到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流产的文化大革命。同1957年那时不同的是，随着刘少奇及其同事在弥补大跃进灾难性后果过程中威信的日益升高，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变得更加强烈与急迫。十年之后，“霸王”的毛泽东终于腾出手来，开始了他自己视为一生中在打倒蒋介石之外的第二件大事，即发动以打倒刘少奇为直接目的的文化大革命。

（2006年2月11日初稿，5月18日改定）

（注释略）

~~~~~

## 【前车之鉴】

### 文化大革命的启示

• 王力雄 •

文革三十周年时，我为《东方》杂志的文革专刊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我从文化大革命得到了什么》。那篇文章的结论是，对我个人而言，我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我在文革所失。那期专刊没被允许问世，《东方》杂志则被勒令关闭。

一晃过去了十年，现在已经是文革四十周年。我要为这个周年写的文章，是想看一下中国能从文革得到点什么？当然，放大到中国的范围，我不会说从文革所得抵得过所失，但是我也不希望只把文革说成是“一场浩劫”就放在一边。因为如果是那样，文革的所有代价都是白付的，所有的遇难者（包括我父亲）也都是白死了。我们应该为那惨痛的代价找到一些意义，同时我也相信历史从无虚度，而智慧就是能从不管任何性质的过程得到启迪。

#### ◇ 领袖与官僚

对今天的中国，政治改革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高度危险的关口。这和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处，1966年的毛泽东也是把政治变化当作头等大事，他面临的挑战也是如何在自己掀起的大风大浪中安全地把握航向。

所谓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即使是在压力下进行的改革，也要有执政集团认可和贯彻，因此改革应该被视为执政集团的自觉。执政集团分为领袖和官僚（专制体制公务员由官僚控制，可视为与官僚一体）。在高度专制的结构中，领袖可以是唯一的，如皇帝或毛泽东；当今中国专制有所松弛，领袖是一个很小的群体，由处于最高职位的数个当权者和有可能晋身最高职位的少数人组成。在领袖之外，政权体系的其他成员都属于官僚集团。

一般来讲，因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于制约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必然反对政治改革，这基本可以当作定论。因此指望执政集团进行政治改革，只能看其领袖有无可能。政治改革当然也要制约领袖，在领袖和官僚集团一致的情况下，政治改革不会有任何希望。社会变化只能来自危机造成政权垮台或是自下而上进行革命。这种前景暂且不在这里讨论（那是另一个专题）。就政

治改革而言，如果官僚集团的反对是定论，领袖却非绝对如此。领袖是个人，个人总会有变数，理想、高瞻远瞩、历史感、或是功利追求，乃至政治斗争的需要，都可能造成领袖与官僚集团的不一致。政治改革可以为领袖带来的历史荣誉也是一种吸引。官僚集团是不受这种吸引的，因为荣誉只会属于领袖，官僚只能得到损失。官僚中当然也会存在有超越性的人，但他们的超越只有在接近官僚阶梯顶端时才会有意义。只要还未晋升到领袖位置，官僚的超越就只能是向着更高职位的超越，而不可能是超越体制，想升迁就得接受官僚集团的法则，否则就会被踢下升迁的阶梯。只有在达到阶梯顶端后还能保持超越性，那时不再有更高的权力和职位需要超越，超越才可能针对体制。

专制权力具有总体性和全能性，专制领袖面临的挑战、涉及的问题，配置资源的考虑也往往是总体性的，不在体制之内，而是在体制之外或不同体制之间。这为超越提供了视野和选择。官僚则置身体制之内，只能在体制内生存、发展和竞争，离开体制内的生态圈就会消亡，因此官僚既无超越体制的需要，也无超越体制的可能。

明白了上述关系，下面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中国能否出现愿意进行政治改革的领袖；第二，这种领袖能否战胜反对政治改革的官僚集团。

#### ◇ 领袖对政权的超越

多数专制领袖毫无超越性，只想把持绝对权力，然而历史上的确出现过例外，较近的如蒋经国、戈尔巴乔夫。毛泽东也是其中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是毛力图实现超越的一次豪赌。

在文革吃尽苦头的官僚集团决心防止再出现类似文革那种“劫难”，形成了一整套以“党性”、“组织性”、“纪律性”进行审查的机制，保证各级升迁者不能具有超越性，尤其是不能再产生毛泽东那种领袖。中共新领袖都是经过这种机制重重过滤产生的，早应该脱胎换骨，难道还会有超越的可能吗？的确，这种逆向淘汰的机制很可能在今后彻底杜绝超越性的领袖，但是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中共高层，或许还有异数存在。这代人的成长如此不寻常，经历了意识形态颠覆，在文革的熔炉烧炼，造过反，下过乡，置身社会底层，再接受高等教育，吸纳西方思想。经历过如此反复“淬火”的人，会像钻石一样存在复杂的多面，即使在某些条件下只能看到一个侧面的光线（因而能通过体制重重过滤），却不说明不存在其他侧面。当其达到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只要深藏内心深处的多样性还能保持，就不排除在条件成熟时折射出另外的光芒。

废除终生制是中共杜绝毛泽东的重要措施，却恰恰埋藏下驱动领袖进行超越的另一种可能。任期决定了专制领袖的权力不再绝对，一旦退位就会荣耀尽失，班子被撤换，话语被顶替，阿谀逢迎者转换新主。领袖上台之始就能从下台前任看到自身结局。相对终将从顶峰一落千丈的前景，政治改革对领袖造成的制约就不那么可怕。自己不能一直专制，民主就不再一定不好。既然历史车轮不可倒转，靠反对终身制上台的领袖无法否定自己昨天的义正词严，期待其让位的后起之秀也不会让步，此时领袖可以用什么弥补失落？达到权力顶峰的人都会希望晋身伟人之列，而人人皆知下一个中国伟人将从政治改革产生，那么能够在位时享用专制，退位前再给自己博取历史盛名，这种合算的通吃也许会成为一种诱惑。

除此而外，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有启动政治改革的可能。出于利用民意或争取国际支持的目的，以政治改革作为资源和战胜对手的武器，这种所谓“推动历史进步的恶”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出现。哪怕是军队出于野心的干政，在世界民主大潮面前，也要打出政治改革的旗号，才会让干政显得名正言顺。

专制政权在当今世界屈指可数，中国作为主要代表，常常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这种

与文明的背离每每令中国领袖颜面无光，有理也亏三分。而中国的很多问题，台湾、香港、西藏等都卡壳在这里。加上中国社会多重危机不断积累，哪痛医哪的修补应付一时，最终叠床架屋、顾此失彼。当旧体制内的解决手段耗尽时，即使是形势比人强的“危机推动”，也有可能迫使领袖进行超越旧体制的改革。

专制政权领袖拥有集中的权力，和民主制度下只能掌握部分权力的领袖不同，后者受各种制约，不可能按个人意志做出超越体制之举，专制领袖却可以充分使用权力体现个人意志。毛泽东能够翻云覆雨当然不是好事，但是今日中国若不想发生自下而上的暴烈革命，走和平可控的变革之途，最好的希望就在于出现决心超越旧体制、又能善用旧权力的领袖。

#### ◇ 如何战胜官僚集团——文革启示一

领袖有无变革愿望是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方面是有无实现变革的途径。如果没有途径，领袖甚至不会暴露变革的愿望。领袖从来不会有愿望就行动，而是首先要有成功的把握。

官僚集团对任何改变专制制度的尝试都将全力抗拒。按照通常看法，政治改革需要一个超越体制之上（如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强人来推进，才能战胜官僚集团。执政集团目前看似铁板一块，原因既可能是领袖与官僚共同抗拒改革，也不排除领袖有变革之心，却有心无力，既没有变革途径，也缺乏毛泽东的强势。今日官僚体制对领袖的制约比过去大了很多，一方面是领袖弱了，不再有打江山的光彩和意识形态的神圣；另一方面是官僚体制强了，有了更多自主性。毛后三十年中共的“党内民主建设”，实质就是官僚体制的不断规范化和程序化，以制约领袖的所欲为。

不过在我看来，领袖的强弱对启动政治改革并不构成根本障碍。过于强调政治强人的作用是不利的。既然今日中共已不再可能产生毛泽东式的强人，认定没有强人就不能推进政治改革，也就断绝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希望，让拥有改革意愿的弱势领袖无法产生付诸实践的勇气。

其实回顾文革，仔细研究一下毛当年的超越体制，会发现并非因为他是强人就能打败官僚集团。即使那时毛强而官僚集团弱，毛仍然长期为体制所困。他掌握政权后最多考虑的就是如何突破官僚集团的罗网。他是头脑，有绝对权威，但头脑实现意志离不开手和脚——也即官僚集团的日常执行和贯彻。官僚集团由成千上万有自我意识的活人组成，每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当他们发现头脑的意志和自身利益冲突时，会不约而同或共谋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利用贯彻执行的权力将头脑意志扭曲变形，或使其议而不决、不了了之。领袖无奈官僚是一个历史难题，无论对皇帝还是对毛泽东，或是对现在的“中央”，其根源就在于领袖与官僚集团的关系是“以少制多”。领袖再强，一双眼睛又如何看管得住百万官僚？虽然毛被捧在神明的位置，但是连他居住的北京，对他而言都成了“独立王国”，让他抱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因此，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强领袖和弱领袖没有区别，都不能让官僚集团服从。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因为那些方法都要通过官僚集团才能实行。即便是被称为“文革”前奏的“四清”，他仍然想通过政权体系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然而他最终发现，那根本就像是刀锋砍刀背一样不可能。官僚集团怎会真对自身动刀？他只有寻找另外的力量对付官僚集团。

这才有了“文化大革命”。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超越官僚集团，直接向民众发布号召，指挥民众行动。他不再通过组织系统传达和贯彻他的意志，而是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民众直接表达，授权民众不服从官僚集团。毛发动文革时的举动——接见红卫兵、写大字报、支持造反、鼓动串联、发布“最高指示”等，都为了跨过官僚集团，直接指挥民众。这种史无前例的超越

不仅使官僚集团无法再阻挡毛的意志，连其自身也被打倒。然而这不能视为政治强人让官僚集团服从，反而正是说明即使以毛的强势，也无法指望官僚集团服从，他才必须利用民众之力将其摧垮。

毛打倒官僚集团不是靠自己，而是靠民众。毛的作用只是教给民众如何做，授予民众合法性，其余的都是“放手发动群众”，让民众“自己解放自己”。之所以民众打倒官僚集团如摧枯拉朽，在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以多制少”。这应该是文革的一个重要启示：战胜官僚集团，不能用体制内的方式，也不能指望依靠强势领袖，唯一的可行之路，就是由超越官僚集团的领袖直接与民众联手。这是文革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遗产，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可以说，政治改革最困难的问题——如何战胜官僚集团，已经由文革给出了解决之道。

#### ◇ “不立不破”——文革启示二

毛的悲剧在于虽然成功地实现了“破旧”，却没有成功地做到“立新”。让民众直接掌握政权只是一种动人的理想或蛊惑，现实中却没有操作方法。毛可以直接联手民众打倒官僚集团，但失去了官僚集团的管理，社会也就失去秩序，导致“天下大乱”，难以为继。只要专制本质不变，领袖最终只能靠官僚集团进行统治。为了从“大乱达到大治”，实现“安定团结”，毛不得不在“全面内战”后重建新的官僚集团。文革由此蜕变成一次“吐故纳新”——将原来的官僚更换新人，而结构和机制原样未动。然而新人会变，进入政权的“工农兵”在掌权中迅速沦为新的官僚集团和特权者，重新脱离毛的监控。毛只有宣称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以此威慑官僚集团。然而除非他能“万寿无疆”，只要他离开人世，尸骨未寒，官僚集团就会彻底复辟，比原来走得更远。复辟者最先做的，就是把他赋予民众造反的合法性宣布为违法，将民众仅有的政治权利彻底剥夺。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官僚集团对民众力量的惧怕。

之所以毛泽东和民众联手能摧毁官僚集团，却无法防止官僚集团复辟，原因就在没有找到取代官僚结构的方法。毛的“破字当头”、“不破不立”的逻辑无法摆脱困扰他的悖论。先破掉官僚集团，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出现动乱。为了避免社会失控，当务之急是重建政府，而非追求立新与超越，于是又要重新借助官僚集团。掌权的官僚集团会立刻轻车熟路地恢复原有结构。在那种没有超越性的重建中，即使把官僚集团全换上新人，也是换汤不换药。所谓造反者一掌权就变质，道理就在这里。中国历史的“两暴循环”也可以从这里寻找答案：“暴民”就是先破之后的失序，那时的恢复秩序只能借助“暴政”，于是就重回原本结构。因此只要是“破字当头”，“立”就没有可能，前面所“破”掉的，也都会重新复辟。

要避免文革的结局，必须把“破字当头”改成“立字当头”，只有先立后破，才能真正立得起，也才能真正破得掉。先立，意味着不是先破坏旧秩序，而是立起之后自然顶替旧秩序。如果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凡“立新”之处新秩序已经形成，尚未“立新”之处仍会保持旧秩序，社会因此始终不会失序，直到新秩序全面建立，旧秩序才会寿终正寝。这样的转型便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因为不失序而不会出现“暴民”，从而也就没有重返“暴政”的理由。“立字当头”的结果，最终是“破在其中”——这应该作为文革的另一个启示。

#### ◇ 今日领袖的劣势和优势——文革启示三

毛在文革中的时进时退、左右调整，其实也反映了他既想超越官僚集团、又离不开官僚集团的两难。不过他的政治强人身份，这时倒显示出作用。他在超越时能联手民众摧毁官僚集团，而在需要恢复秩序时又能重建官僚集团。不管文革落到如何乱局，他都有把握力挽狂澜，即使在官僚集团全面瘫痪的权力真空中，也能让社会保持基本服从。毛能做到这一点，筹码就是民众对他的“个人迷信”——这是他作为政治强人的根基所在。从这个角度，毛对“个人迷信”

的培育，鼓励对他的造神，与其说是出于爱好，不如说是在锻造立于不败的看家手段。

今日中国已无培育个人迷信的土壤，毛式强人也不会再现。既然没有强人无法收拾乱局，就必须保证不能再出现文革那种“天下大乱”。这应该作为文革的另一个启示。也就是说，今天即使能用毛联手民众的方式摧毁官僚集团，也不能那样做，原因就是谁也收拾不了那种大乱。而今天的大乱所带来的灾难，将会远远超出文革。因此，今天的政权领袖与民众联手，只能是“立”，从“立”着手，以“立”而“破”，用循序渐进的“立”逐步取代官僚集团，而不是一下子将其破掉，才能防止出现导致乱局的权力真空，在转型过程中保持秩序和稳定。

有人对此会质疑，官僚集团难道能坐以待毙，等着被取而代之吗？毛泽东之所以必须摧毁官僚集团，正是因为官僚集团不倒，文革就不能发动起来。今天的官僚集团除了会像当年一样“镇压群众运动”，对试图像毛那样跨越官僚集团联手民众的政权领袖，也有能力进行罢免。在文革中吃了大亏的官僚集团在毛死后的三十年，用程序化和制度化大大加强了对领袖的制约，不会允许再出现超越官僚集团的政治强人。别看今日的政权领袖在其他方面一言九鼎，若是涉及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安全，受到的制约与毛已不可同日而语，决不再能随心所欲，否则就会被“开会拿下”。

的确，官僚集团对领袖建立了更强的制约，但那只能使具有超越性的政权领袖更无其他选择，唯有使用毛的手段——跨过官僚集团与民众直接联手，才能实现超越。官僚集团固然对此不会坐视，然而文革经验已经证明，只要真正给了民众政治权利，让民众“自己解放自己”，与官僚集团形成以多制少的关系，官僚集团根本不是对手。不错，今天的官僚集团有能力罢免政权领袖，但那存在一个从集结力量到启动程序的时间差。以今天的技术手段，那个时间差已足够领袖完成与民众的沟通，把“立新”方法交给民众，授予他们不服从官僚集团的合法性。当年为了做到这一点，毛在1966年要把1300万红卫兵调到北京接见，动作之大、成本之高难以估量。而今天利用普及全国的电视网络，政权领袖可以在官僚集团无知觉的情况下，瞬间就能面对数亿民众。这种优势是毛当年没有的。

不过，既然不能摧毁官僚集团，领袖与民众的联手的时间不会太长，就将被随后动员起来的官僚集团罢免。那就要求领袖发动民众进行的“立新”，必须具备能够自我复制和自动扩展的能力，一经启动，便完全由自发的内力驱动和运转，直到整个社会完成转型，都无需再有外力推动。这种转型要求领袖提供的只是“第一推动力”，即使领袖随后立刻被罢免，官僚集团也无法再阻止“立新”的继续。面对自我复制的“立新”遍地开花，所有镇压都是杯水车薪，徒劳无功。

那时，领袖虽然被罢免，但既然是任期制，迟早也会下台，损失不了多少。少当几天官，成为改变历史的人物，应该是值得的。何况只要转型成功，以其贡献，谁敢说不会再有另一番前途呢？

#### ◇ 实现政治转型的关键

问题最后归结到，那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立新”？

首先历史已经证实，即使是文革那样“天翻地覆”的革命，如果改变的不是专制体制本身，仅仅是更换官僚集团，政治本质也不会发生变化，甚至还会后退。毛斗了一辈子，死前发现他一生致力消灭的“资产阶级”原来就在他领导的共产党内。这种荒诞剧式的结局足以告诫后人，不终结专制体制，政治改革就不会有真正的“立新”。终结专制体制的关键在于调转权力源头，把权力的从属关系从自上而下变成自下而上。由此出发，超越性领袖与民众的联手，就不能是

为了战胜官僚集团的一时之需，而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把权力源头转移给民众。

只有实行了这种转移，在领袖被官僚集团罢免之后，民众才可以仍然不服从官僚集团，因为他们自己已成为权力源头，不再是他们应该服从官僚而是官僚应该服从他们了。这可以使他们理直气壮地坚持“立新”，最终自下而上地取代官僚集团。也只有实现这种转移，才能避免毛当年对官僚集团一时成功、终归失败的结局。因为权力源头在上的社会离不开官僚集团，即使一时能摧毁官僚集团，也必须马上重建，领袖仍然会在以少制多的劣势中重陷官僚集团的罗网。

超越性领袖转移给民众的权力，必须首先是从基层单元开始。如果超出基层单元的范围，民众会失掉自行操作的能力，只能依赖主持。那时权力就会落到主持者手中。这看似只是一个技术细节，实际却是“主权在民”至今无法实现的关键。而“以多制少”的政治结构，也同样要求把操作限定在无需主持的范围。范围过大，人们相互之间无法直接沟通，离不开主持，以多制少就是空话。没有主持的“多”是一片散沙，主持者却正是应该受制的“少”，刀锋砍刀背的悖论于是重现。只有在人们可以直接沟通和决策的范围，“以多制少”无需主持就可实现，权力才会名副其实地被民众掌握。

当然，民众仅有基层权力是不够的，既然是权力源头，就要能自下而上地延伸权力，建立自下而上的权力从属结构。这要求一种逐层向上递进的整合机制，使“立新”过程如同自动生长的系统，只要根部的基层单元完成了“立新”，就可以进入下一层次，对已经完成“立新”的单元进行组合，以自组织的方式自下而上、分层次地实现“立新”扩展。这种扩展将随着层次提高实现理性提升，不会像同层次的规模扩大而造成非理性的叠加（如在普选或公决中发生的情况）。如此逐层搭建起新的权力结构，最终延伸到顶层，整个社会的转型就告完成。转型最终完成之时，就是原有官僚集团彻底退出权力舞台之日。

不过，官僚集团退出只是其作为制度性利益集团的退出，不能让社会管理职能与专长也随其一同退出。新的整合机制需要把公务员系统与一党专政的体制剥离，完整地接收其管理职能，充分吸纳管理人才，同时妥善安置出局人员，最大程度地避免振荡。这要通过一个细致耐心的过程，不能靠“剧变”，而是在自下而上的循序渐进中实现。

现在，文革已经给我们指出了跨越官僚集团的途径。对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剩下的关键是找到符合上述条件的“立新”方法。这是思想超越的任务，可以从民间进行努力；另一个关键是产生具有超越性的政权领袖，这却是民间无力把握的，只能当作不可预测的奇迹来期待。然而这两个关键缺一不可，如果不能找到可行的“立新”方法，或者是没有出现超越性的政权领袖，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等待革命的风暴降临中国，并准备在那个过程玉石俱焚。

~~~~~

【书刊评论】

红卫兵红八月的心理关口

• 鲍志奋 •

清华附中老红卫兵禁书辗转到香港问世，披露当年同学打同学，涤荡青少年心间尚残留的温情。从凌辱校领导、教师到迫害同学，红卫兵度过心理关口，把红色恐怖推向血腥的高潮。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中国大陆一片冷清，仿佛根本没有文革这回事，宋柏林的《红卫兵兴衰录》无法见天日，辗转到香港出版，为纪念文革发出特殊的声音。

回首当年，清华附中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中国最早的红卫兵在该校校园诞生，宋柏林的同学骆小海等人更撰写日后成为全国红卫兵行动纲领的《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毛泽东对这批战斗“檄文”予以高度肯定。可贵的是，宋柏林今日以《红卫兵兴衰录》为书名，出版当年的日记，除了错别字，不作删改，并请钻研文革史颇有成就的学者余汝信编注。

包括宋柏林在内的多位清华附中红卫兵，曾于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得到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接见。这一殊荣受到全国所有红卫兵与青少年的景仰与羡慕。

“八一八”这天，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由清华附中红卫兵衍生出来的五十万身穿绿军装、臂套红袖章、狂呼“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英雄的红卫兵万岁》，以极其赞赏的口吻称红卫兵是一批“生龙活虎”。他们“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的残渣余孽……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搞得狼狈不堪，红卫兵做得对，做得好！”

据八零年审判四人帮时中国媒体的披露，一九六六年夏天仅北京一地，就有一千七百二十二人被打死，火葬场焚化炉不堪重负。时值八月盛夏，火葬场工作人员把大量冰块放在待烧的尸体上，以防迅速腐烂。死者来自红卫兵的拷打现场，尸体血肉模糊，“冰水和血一道流淌，气味难闻，惨不忍睹，恐怖至极”。北大附中的目击者回忆说，曾看到死尸被丢在校内空地上，红卫兵骑着抄家抄来的摩托车从尸体上碾过来碾过去。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红卫兵对公民的蹂躏，其残暴程度直追希特勒党卫军的暴行。

红卫兵突然变得格外暴戾，是一个“谜”。而宋柏林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的日记揭示了红卫兵爆发“天子之怒”的原因。“半夜一连传来了三、四起杀害红卫兵战士的事件，大家真是义愤填膺。这是阶级斗争，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我要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

所谓“杀害红卫兵”事件”，据传说是北京市民李文波在抄家和被批斗时行凶报复，用菜刀袭击红卫兵；李文波当场被打死，几天后当局又举行公审大会，宣判李文波妻子死刑。但惨祸的真相是，李文波受凌辱时并没有反抗，在妻子要求上厕所不被允许和遭殴打的情况下，李文波挺身而出，遭杀身之祸。

◇ 皮带竹条猛抽同窗

宋柏林这天的日记还记载，“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这是阶级斗争，你打他，他杀你，这是你死我活”。红卫兵的皮带、棍棒终于落到了同学的身上。被打同学是同龄青少年，与红卫兵的区别仅为来自不同家庭，但他们不曾从事过剥削或有反动经历，他们也属于祖国的花朵。何况这些同学多数人一进中学，就表示“要与家庭划清界线”。

六六年八月，血光之灾降临中学校园。家庭出身有问题同学，像自己多灾多难的父母那样被迫下跪、挨打，人格遭到彻底践踏，被推入了红色恐怖的水深火热之中。毒打同学的行动，像一副猛烈的催化剂涤荡了红卫兵心间残留的一点温情。从凌辱校领导、教师到迫害同学，显示红卫兵度过了一个心理关口，也由此把暴行推向了血腥的高潮。

其实，红卫兵运动的暴力倾向也折射了当年中国的政治生态。一九六四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政见分歧，竞赛谁更“左”，藉以争夺党性与合法性的制高点。在全国范围，四清工作队对一些守法公民进行无限上纲的批判，逼迫他们自我诽谤，批斗时施以拳脚相加的凌辱，完全是文革预演，也为日后红卫兵作出榜样。

与此同时的“学雷锋”运动，当局不只号召学习他艰苦朴素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更号召学习他“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从一九六四年起，中国的大学和中学内开始推行“阶级路线”，冷待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恭维“血统纯粹”的干部子弟与工农子弟。在高干子弟云集的清华附中，校方向干部子弟秘密传达毛泽东与其侄子毛远新、姨侄女王海容的两次谈话。连番“特殊”、“神秘”、“寄以厚望”的活动，酿造了清华附中干部子弟强烈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也源自校方专门为干部子弟组织的各种军训活动，如射击班、航海班、工程兵班等。在工程兵班上，学生学习爆破和点炸药。而军训教练全都是现役军人。

毛泽东的内部讲话“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更令清华附中学生热泪盈眶。

清华附中红卫兵最初是秘密组织，宋柏林日记显示，该组织极富使命感又自视甚高。文革开始后，红卫兵牛刀小试，轻易斗垮清华附中的党组织。他们还与外校的干部子弟相互声援，以共同的高贵血统为傲，并与新崛起、成为毛泽东和江青新宠的平民红卫兵尖锐对立，从而形成全社会都为之侧目的老红卫兵群体。

◇ 最早批文革是左倾

老红卫兵视“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路线”为“专利”，但宋柏林日记则证实，他们的忠诚并不单纯。刘少奇失势，北京老红卫兵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文革与江青，还提出“文化大革命”是“左倾”，而他们只“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零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老红卫兵更狂妄冲击公安部，开始“打、砸、抢”。

老红卫兵在西直门城墙、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大街贴出“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等大标语。可是，当时广大民众并不支持他们，对江青痛骂老红卫兵“血统高贵，什么东西”反倒觉痛快、解气。因为民众不会忘记老红卫兵因取悦最高权势而不可一世，又因得罪最高权势而失宠落荒。六七年一月至四月，北京公安部秘密逮捕老红卫兵一百多人。老红卫兵终成明日黄花。

作为文革研究资料，宋柏林的日记极有价值。少年文字活灵活现再现了红卫兵运动深刻的自私性。譬如，在大串联时，红卫兵占据列车包厢，听凭乘客苦苦哀求，对普通民众冷漠无情。红卫兵热衷政治，却常说让人哑然失笑的大话空话，譬如，“最大的民主必须要有最大的统一，这最大的民主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最大的统一就是全国人人学毛着。”

也正因为如此，老红卫兵与江青等反目，而毛泽东却愿意宽恕，深知他们“还没有长大”、“耍小孩子脾气”。老红卫兵折腾得再厉害，也不会是林昭、张志新，更不会是遇罗克，而永远是自己人。

□ 原载《亚洲周刊》

~~~~~

#### 【难忘岁月】

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  
——一个保守派的自述（之六）

• 刘光耀 •

十三、“相煎何太急？！”

1968年的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47周年这一天，想起党多年对我的培养教育，精神振奋起来，遐想未来，充满信心。我不会写诗，硬学着凑了一首小令，其中几句是“遥遥长矣革命路，抖擞精神紧迈步。紧迈步，全球解放，妖魔尽除。”

不批我，不斗我，也不打我了，我倒又觉得寂寞，一个人在屋里呆呆，到室外转转，无书可读，无报可看，滋味很不好受。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我提出劳动的要求。答复说，没有什么活可干，那你就擦墙上的大标语吧。我找来一些玻璃片，慢慢刮了起来。不多久，令李天增、陈顺卿和我一起搬到另一房间住。我们商量挖地下旧房基砖。得到准许，就干了起来，挖挖抬抬，堆成了许多小山。陈顺卿打趣说：“咱这也是对社会主义做贡献。”挖着挖着，又令我们刻、印“革命歌曲”及其它资料。

“文革”中经常在广播里听到发表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接着，人们就集合上街游行、欢呼。有时晚上下雨，这类活动也照样举行。这类活动，我当然没有资格参加。但我倒庆幸，可免奔波劳累挨雨淋之苦。

“7。15”一周年到了。东工字楼后、8号楼前，是30多个八二四队员在武斗中死难者的坟墓，名曰“烈士陵园”。本来，一年前的“7。15”“老保”被打死10人，翟贵祥是在此后逃难时被南关机械厂“老保”打死，其余“烈士”都是在靠后的东郊枪战中死的，然而1968年的“7。15”却成了“八二四烈士”死难一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上午，李、陈和我正在东工字楼上东北角的大房间刻蜡版，忽听楼后有哭叫声，隔窗一看，见许多披麻戴孝的男女在挨打，有的急往前跑，后边紧跟持棒者追打。他们是外单位的“老保”，光为“烈士”在砖、石上磕响头叫“八爷”并不够，还得再加上“老保”的皮肉供品。于是一幕幕踢打、追赶、哭嚎的“活报剧”上演了。光天化日之下的如此场面，我还是第一次目睹。

中午，我正在数学系办公楼西边的学生大餐厅吃饭，见体育系的两名教师、两名学生戴着高帽、反绑双手被几杆长枪押进来。我见势不妙，忙边走边大口喝下半碗稀饭。还没有把碗洗净，就听一个数学系63级的学生喊：“刘光耀，走！”我被推到那四个人旁边，令我和他们并排跪在一起，有人踢了我几脚。斗过那四个人之后，令站起，排队出门。我放慢脚步，当距他们五、六米远时，走进了数学系办公楼。体育系那四个人到“烈士陵园”给“八爷”磕头之后，被宣判死刑，几声枪响，他们仍然站着，原来是“假枪毙”。

林庆兆、赵玉兰就是这一天下午在“陵园”被打的耳光。

“7。15”一周年“纪念”期间，最惨的是燕勇孝和张俊民。

燕勇孝只是个普通党员、外语系学生辅导员，在“保守”组织里也未担任职务，就是“老保”观点“太顽固”了，一些“八爷”就特别恨他。一天晚饭后，几个造反派学生看管着他，不让外出。晚上8点左右，说让他去大礼堂“开会”，却被枪杆子押到东城墙根儿，蒙上眼睛，反捆在一棵桐树上，几个人轮番踢打，有人用大头针扎他的指甲缝，疼痛难忍。打足打够，松开绑，把他向前推了几步，一人宣判燕“死刑”，“立即枪决！”只听一声枪响，一人从背后用脚

猛蹬一下，他扑倒在一个土坑里，那坑是事先为燕准备好的。然后又把他拉出来，揭去蒙眼布，押回住室。当夜，一位同情燕勇孝的上海籍教师，劝他赶快离开学校，偷偷地送他到火车站，怕被抓住，就让他搭火车往东走几站，再搭往西的火车回老家许昌。两天之后，他才到家。夫人一看，浑身都成了青砖一样的颜色。燕的生殖器被踢坏了，几年以后才复原。

前边已经谈过张俊民被武斗、毒打的情况，在“7.15”一周年这一天，艺术系的一些人，又把他押到“陵园”，按住他的头，强令他在石板上给“八爷”磕响头，直磕得前额肿得像馒头。回到“牛棚”后，艺术系的造反派头头怕“影响不好”，就不让他自己到饭厅吃饭，而是由造反派的人去把饭端到“牛棚”里交给他。张俊民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就想跳楼自杀。但想到住的是二楼，跳下去怕死不了，落个残废，惹人耻笑，更糟糕。当他能去饭厅买饭时，见韩倩之买两份条子肉吃，心想，韩倩之不仅不想死，还要尽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我也得这样，不能死，不能当“叛徒”。

在“7.15”一周年“纪念”活动中，我还算“幸运者”。因此，在北郊劳动，让我戴着大“名片”在农民家吃饭时，一个女学生说：“我们是按政策办事的。你叫他说，‘7.15’一周年那天，有的单位叫老保头头儿磕头，我们叫他去了没有？”好个“按政策办事”，真个凭“良心”！

几个月了，我就上街一次，还被小偷儿偷去了钱和饭票。无钱买牙膏，更无钱买饭票，咋办？只好找那位教师身份的革委会委员。他不给解决，我豁出去了，把桌子一拍：“我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矛盾？你把文件给我搬出来，按哪一条扣我的工资、冻结我的存款？！”他无语。他们经过研究，终于让我从银行取出100元。给我母亲、岳母、外祖母共寄去80元，我留20元。

从4月份我被批斗之后，同志们看见我不敢打招呼。有的仰脸看看天，有的缓慢地点一下头。数学系的共产党员、干部左德有在厕所里见我，问：“听说你的饭票丢了？”他悄悄地给我了10斤粮票。

一天上午，正在刻蜡版，我突然大声朗诵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很快被告。下午，传讯我到64级一个宿舍，要我再背诵一下上午朗诵的诗。背完后问我：“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这是我从小读的，是曹植的《七步诗》，曹植的哥哥曹丕令他走七步成诗，否则杀他。意思是，兄弟之间，何必互相残害？我的意思是：我们两派都是阶级弟兄，何必互相残害？”他们无言，放我回去。我刚回到刻印室，一个同学就跟了过来，问我“燃豆其”的“其”字怎么写，并让我把那首诗写下来拿了去。噢，我体会到了“告密者”的“良苦用心”，这位同学的如此行为，就是背诵那首诗而被告的效果初现。这使我又想起5月下旬的一件事。一个同学到我房间，先自我介绍说：“我是外语系64级学生，八二四的。”然后，他拿出数学系“革委会”印的带有“编者案”的供批判的两篇文章：《多余的声明》和《上访提纲》，说：“你写的文章很有气魄。”他低头思忖了一会儿，欲言又止，就走了。我还从未见谁写出批判我那两篇“大毒草”的文章，也未听到有人发言批判，今天倒听到一位八二四造反者的如此评论，这正是那两篇“大毒草”让批判的效果。

相煎何太急？！毛主席您老人家为什么要让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您的同事、您的部下遭受残害？！为什么要让炎黄子孙互相残害？！

“文革”开展以后，不仅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干部到群众，都被分裂成为互相对立的两大派，工、农、商、学（知识分子）、兵（主要是军校）都被卷了进去，而且，许多家庭也打起了内战。开封师范学院一位党委机要室的打字员（“老保”）要和在某厂当工人的丈夫（“老造”）

离婚。民政局工作人员劝他们：“因为派性观点不同就离婚？你们回去好好想想吧。”未批。开封师范学院政教系一位中年讲师，是河南省某专业的一位“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专案组派人找他在某中学任教的爱人，令其揭发丈夫的“罪行”。专案组以这些上不了纲的“罪行”材料做“炮弹”，逼迫该讲师交代其“反革命罪行”。该讲师除了交代其个人的某些“罪行”外，又揭发了他爱人的几条几乎可以上纲的“反革命罪行”。因此，他爱人吃尽了苦头受尽了折磨。但到后来落实定案时，该讲师全部推翻他对其爱人的揭发。某中学专案人员问：“当初你为什么那样揭发？”该讲师振振有辞：“谁叫她揭发我哩？我报复她哩。”真是恶作剧！

#### 十四、“刘少奇的孝子贤孙”

1968年8月下旬，工军宣队进校，取代了派性革委会的领导权。但“老革”“老造”们对我们这些“虫”们，那些“走资派”们以及那些“老牛鬼蛇神”们，仍然斗争不止。数学系革委会令我和“走资派”及“老牛们”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同学习、同劳动，年届花甲的“老牛”也得拉大胶轮车。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11月2日公布了全会公报。公报说：“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在城市一阵欢呼之后，要到冷清的农村宣传。于是，数学系的“走资派”和我以及那几头“老牛”，或戴上刘少奇的面具，或戴上王光美的面具（我戴的是刘少奇的），挂上大牌子，被夹在敲锣打鼓者和学生队伍之间，到郊区农村去了。每到一地，就让我们跪在地上，“革刘少奇的命”者先宣讲《公报》，再让我们揭开面具，露出真相，向众人介绍：这都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一个个历数其“罪行”。我们这些新老“牛鬼”都和刘少奇联成一族之亲了！

回校之后，我又想了许多。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他怎么能“睡”在毛主席身边那么久，而竟没有被“最伟大、最智慧”的毛主席和毛主席身边的“火眼金睛们”发现？不是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吗？怎么当今出现了如此大的反差？这是我从思想上对毛泽东又一次提出的质疑。我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岗位，曾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读过好多遍，能够背诵其中许多佳句，还读过他的《论党》，不仅是我，我发现很多很多人都把刘少奇当作自己的楷模。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黑”，黑到哪里？它的精髓的的确确渗透到广大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追随者的思想灵魂深处了，可谁会感到它有不妥之处呢？它的发行量那么大（1800万册），影响那么广、那么深，毛主席和党中央可从来没有提过批评啊！想来想去，我最疑惑的还是那个“叛徒”结论。关于“叛徒”的那些“罪证”的真实性到底如何？靠得住吗？“61人叛徒集团”，几十年都没有被大人物们发现，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让一些中学红卫兵毛孩子给揪了出来，岂不怪哉？

我越想越想不通，对于我受的“待遇”，越想越恼火。于是，在“上班”时大发牢骚：“硬把我们往反革命那边推”，“连通讯自由也没有了”，“开除也行，判刑也行，想咋整咋整，随便！”

（未完待续）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mailto: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 (WWW) 地址: <http://www.cnd.org/>

---